
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容

——从文明论角度的考察——

赵宏伟

(ZHAO Hongwei, 法政大学)

一、文明论的考察

与作为人的精神产物的狭义的文化相比，文明所指的是人的精神产物和物质产物的复合体。如果把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的“文明的冲突”理解为从文明论角度对国际关系的分析，那么从文明论角度对政治学的研究则应该提出“政治文明论”。

政治文明论承认文明的地域性。任何文明都起源于特定的地域，并被传承下来。

政治文明论重视文明的传承性。文明是在传承中自发进化的。

政治文明论强调文明的相对性。不赞同与西洋文明相比其它的文明都是野蛮、愚昧的这一绝对性的说法。

政治文明论认识到文明的融和性。文明的变化除了自律性的进化之外，还受其他文明的影响。一种文明的变化是在接受其他的文明，或者溶入到其他的文明之中这样的融和过程中实现的。

如果运用以上的政治文明论的理论框架来说明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的话，可以建立以下的假设。

中国文明，以及日本文明和朝鲜文明与世界上其它的发源于数千年以前的文明，比如说古代地中海的种种文明相比，有数千年来代代相传从未断绝这一特点，即传承性很强。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变化过程中虽然有对外来冲击做出的反映，比如说有引起历史断层的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中国的政治文明的方向总体上仍然遵循主流。这叫做“中华本流”。

中国的政治文明和政治体制具有相对性。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和民主主义政治体制也并非具有绝对性、因此不应该对与之相异的中国政治文明和政治体制判断其是文明还是野蛮。很多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都是把问题意识着重放在善恶的价值判断，或者以西方为标准衡量中国与西方的距离。与此相比，探求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方式、存在的根据、及其自律性变容的状况和结构更有意义。

中国的政治文明和政治体制具有融和性，接收了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这些西方的政治理念。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容是在传承历史本流的同时，又受到异文化影响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我曾经尝试通过追溯古代社会和国家的形成来说明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也可以说是

以文明论观点进行的研究。《中国多层集权体制和经济发展》(*China's Multi Centralized Regi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Political Regime of Contemporary China*,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3)。这些研究主要论述以下几点。

受华北地区的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影响，再加上早在2500年前就开始普及的铁器农具和牛耕的技术，以独立农家为中心的古代社会在中国形成。这是全世界在近代以前只有中国出现的现象。

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类似中世纪欧洲的领主、庄园主一类的中间统治阶层。因此为了统治多如沙尘般的独立农家，官僚制成为必不可少的制度。全世界在近代以前只有中国出现并形成了古代官僚体制。

以上所述的各种特征确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特点。官僚制的效率性使得统治者可能统治广大的地域，促进了统一的大中国的形成。但是由于官僚制的局限性，统治者不得不将大中国分为各个省进行统治，而且在官僚实行的“官治”所涉及不到的村这样的末端社会层中，则由当地的民间英才实行自治，即“民治”。如此，在末端和中间的各个社会层中支配地域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地方统治者。并且省级统治者也当然参与中央级的政策决定。这样的权利构造只有在中国出现，并传承至今。中国政治体制的以上特征使其拥有“多层集权体制”的性格。

二、中国的政治文明的本流和共产党向“全民党”、“中华党”的转变

以下从文明论角度尝试验证江泽民时代以来的政治变动。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关于党的阶级性以前定义为“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在第16次党代会上，加上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概念。共产党逐渐转变为“全民党”、“中华党”。

转变的第一步是在1997年。江泽民在第15次党代会的报告中，重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共产党原被理解为起源于1919年的“5·4运动”，江泽民则把共产党的革命史置换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史，追溯到20世纪初，将孙文、毛泽东、邓小平三人定位为“中华民族振兴”的三个伟大人物。这就改变了原来的代表资本主义革命的是孙文，代表社会主义革命的是毛泽东这样的阶级论的观点。

在这样的中华民族振兴史的延长线上，江泽民给自身授予的使命，在5年后的第16次党代会上变得更为明晰。就是把共产党转变为以中华民族振兴为目标的“中华党”。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精英人士，开始反省近百年来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憧憬，以及在西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影响下所形成的经历，开始有意识的向自身的文明这一本流靠拢和恢复，并且这种倾向越来越强烈。江泽民则以孙文取代以往的党的创始人作为中国革命的先导者。

从文明角度的考察，重视政治家的个人史。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出生于从安徽省移居到江苏省苏北地区的明清徽商世家。两人既是同乡也属同一社会阶层。与此同时，两人又同毕业于培养中国知识阶层精英的名门小学、中学和大学。应该说邓小平选择了相同类型的政治家

作为自己的后继者。

胡锦涛也是具有强烈的中华本流意识的精英。他在当选党总书记的第二天所公布的履历表的第一行中，填写的是“安徽省绩溪县人”。可是胡锦涛是江苏省泰州市的胡家的第5代，无论从户籍法还是从习惯上来说他都不应该是安徽省绩溪县人。胡锦涛特别看重的是，绩溪县胡家的1600年的历史，辈出诸如明朝的重臣、明清的豪商、民国的国学大师（胡适）这样的出类人才的家系。以及作为嫡门本族的第48代孙的自豪感。

三、中国的政治文明的重建和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十六大中运用了“建设政治文明”这一新的表达方法来说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中国社会里，政治文明这个词语并非是指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主义，而是指与野蛮相对而言的政治文明。传统的中国的政治文明可以用启用知识阶层精英这一手法来代言。在科举中战胜的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文明人”，以文明人为主导的出色的政治则被认为是文明的政治。无学之士如果执政则会出现混乱，那就是野蛮的政治。建设政治文明是中华本流的政治文明的重建。

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可以期待党内的民主化、促进权力的分散、以及扩大末端社会组织中的直接选举这三个领域的进步。其主要目标是扩大党的政治基础，实现政治和行政的效率化，以及提高党的领导和法治之间的统合性。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理解为政治体制将由多层集权体制逐渐演变为中国式的多层民主主义体制。也就是由以往的集权型社会阶层构造，转变为中国式的以精英执政为特点的民主型社会阶层构造。

在基层社会组织中进行直接选举。在中间层社会组织中实行常委会和立法部门的一体化，建立行政决定的执行与监督的分离这一独特的权利分散系统，但不进行直接选举。对于中央领导阶层，虽不进行直接选举，但开始实行最多连任两期10年的任期制度和70岁退休的制度。从而使权利和权威在一定程度上从绝对性的逐步转变为相对性的。这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的形态，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形态”。

作为改革重点的党内民主化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以下机能的政治体制结构，即能够将包括资本家在内的各界精英人士集中到共产党内、能够通过实行党内民主从7000万人的党员中选出最为优秀的精英、能够启用知识阶层的精英人士以便更好地管理国民等等。政治体制改革所追求的政治文明，是建立在以7000万党员为核心的知识阶层精英这一基础之上的。

四、重新构筑“中华世界”——展开“兄长外交”

重新构筑中华世界，体现了中国已进入复兴中华本流的时代。

江泽民从邓小平手中接过全部权利，提出以“新安全观”作为外交战略。即脱离一直延续到邓小平时代的、以非同盟为根本的“中国式孤立主义”，与周边各国建立多种多样的集体体制的战略。2003年，中国建立了以实现“中亚共同体”为目标的上海合作组织，以构筑“东亚共同体”为目的与ASEAN缔结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与日本和韩国也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事宜达成协议。特别是针对北朝鲜的核问题中国显现出以往没有过的积极性，

目的是为了构筑东北亚的集体安全机制。

江泽民之后的中国外交可以用“兄长外交”的概念来形容。“兄长外交”这一外交文化，可以从历史上的“华夷秩序”、“朝贡外交”中寻找其传统上的因素。

五、总结

1995年前后，自江泽民从邓小平手中接过全部权力开始，中国在政治、外交政策的转换方面出现了很大进展。如果从文明论角度来考察的话，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的变迁呈现出这样一幅画卷，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学习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并实践了西方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有意识的恢复自我的传统，即回到中华文明的本流。可以说中国进入了一个中华本流复兴的时代。

这样的政治局面的变化如何评价，应该取决于其对中国是产生正面影响还是反面影响，以及什么样的正面影响和什么样的反面影响。到2003年的今天为止，其影响主要是正面的，但着眼于长远的蓝图、展望将来的时候还要打一个问号。

(俞嵘 译)